

精神鼓励更久远

翻看日历,快到儿童节了。媒体上是各种与儿童吃、穿、玩相关的广告,以及各种儿童节活动的预告,窗外楼下的小学教室里,孩子们的稚气的朗读声,把我带回逝去的童年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儿童节,尽管已那么遥远,但往事并不如烟,小学一年级时的那个儿童节,一直铭刻在我心中。

“六一”前的晚上,我久久不能入睡,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,画面一个连着一个,想着明天将会发生的事情,显得心神不宁。“六一”那天,我起得很早,吃完外婆为我准备的早餐,便离家走出深深的小巷。那天有件大事等着我——我将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,能戴上红领巾,是我儿时的梦寐以求。于是,不由加快了脚步,连蹦带跳赶往学校。

上完两节课,我随老师步行去吴桥附近的解放电影院,庆祝“六一”儿童节的活动在那里举行。能容纳几

百人的电影院里座无虚席,在“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”的少先队队歌声中,庆祝活动开始了。这样的场面,于我来说是第一次,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。特别是我作为班上唯一的学生代表参加庆祝活动,还上台领取红领巾,怎能不骄傲和自豪!毕竟,那时的儿童节,精神上的“礼物”在我们心里有更高的地位。

以后的儿童节,都是在“文革”中度过的。父母忙于工作,没时间陪我们过节,也没儿童节的氛围。记得上小学二年级时,儿童节前的一个周日,妈妈答应给我买一本书,作为儿童节的礼物,为此我提前几天就去了北大街上的新华书店,“看中”我想买的书。那是一本名为《东方红》的书,讲述的都是革命故事。我拿到书后,如获至宝,在那精神生活贫乏的年代里,一本薄薄的书,一直陪伴着我,读了一遍又一遍。

后来慢慢地长大了,儿童节也在

我们心里渐渐淡化了。

再关注儿童节,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女儿出生后。女儿上幼儿园时,每逢儿童节,我总是调休带她去锡惠公园或城中公园玩,给她买些贺卡、文具、书籍等小礼物,后来又自己动手做贺卡送给她。当然,戴上红领巾,拿回“三好学生”的证书,受到市、区表彰,也是女儿高兴的事,但她没有得到过吃一顿大餐或是外出旅游的奖励。而对于我们做父母的,仍然觉得精神上的鼓励比物质性的重要。

记得女儿小学五年级的那个儿童节,我告诉女儿,我会调休半天,陪她去锡惠公园。女儿说:“爸爸,我跟同学约好了,我们明天有活动。”那一刻,我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:欣喜女儿长大了,她有自己活动、自己的朋友;也感到有些怅然,觉得女儿不是太需要我的陪伴了。

看着如今的孩子过儿童节,不由感叹:现在的孩子是幸福的,丰富的

消费品和活动让孩子们节日多姿多彩,也让孩子们见多识广。但如何让孩子们节日真正过得有意义,也应该是家长们思考的问题。但愿孩子们也能在上年纪后,记忆中能留下对儿童节的深刻印象。

(李河)



宗海东/插画

削水片

早年的村庄,全紧挨着河道或大水塘。我的老家门前,就是一条四通八达的伯渡河,河南河北,用乡俚俗语说,那是两三百户人家的长村大巷。那时,家家户户人丁兴旺,小孩特多。不分四季,利用宽阔的水面,大呼小叫邀上小伙伴,来个“削水片”比赛,这成了我们乡下孩子最爱玩的游戏之一。

削水片,书面语称“打水漂”。虽然打水漂听起来很洋气,还有投进去后如石沉大海化作泡影的引申义,但从动作的标准意义上说,一个“削”与一个“打”字,我觉得用“削”来表达,更贴切、直白、形象,更接地气。

削水片,最随手可得的材质是瓦片。那时庄稼的肥力,有一小部分来自鬲河泥。无论用网夹,还是用畚箕扒,抑或用网袋拖,淤泥里的瓦片都得往岸边扔。周而复始的鬲河泥,加上造房起屋,屋顶修缮的碎瓦,全都倒放于河滩。也就为我们提供了常玩常有的机会。流经我家门前的伯渡河,水域很宽,又有平缓的岸滩,所以是我们玩水漂的理想地方。

将扁型又略带小弧度的瓦片或石片、瓷片,用拇指与食指勾住,让它呈水平后,脚跟站稳,收腹侧腰,手腕一发力,小手臂

一挥,瓦片就“嚓嚓”贴着水面,像三级跳远状向前跃动,直至沉入水底。

起初,我们只是觉得好玩而已。后来,我们就开始比谁漂得远,还让一小伙伴站在不远处当裁判,当然只能目测。有点心计的,会找来润光发亮的瓷片削。瓷片平滑,瓦片毛糙,在接触水面时,瓷片自有优势。为了体现公平竞争,比赛规则里要求材质得相同。

这样的比赛,时间一长,便有玩腻的感觉,于是又比谁的瓦片跃动次数多。但瓦片在水上漂的速度极快,我们还采用了两种计数方式。两个伙伴做裁判,一个看着数,一个听声音,再合计。如果不能达成共识,就采用平均值。看着那连接不断的“嚓嚓”声,无论输赢,满心喜欢油然而生。

乡土味极浓的瞬间削水片游戏,虽然在我们江南水乡几乎绝迹,但在世界范围内,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丹麦等国家,每年都会有正儿八经的打水漂锦标赛,比赛规则就以弹跳次数的多少决定胜负。

削水片,虽然仅是童年时期的一个小游戏,但它带给我的快乐与满足犹在眼前。

(过正则)



宗海东/插画

无法复制的美味

前些时候,朋友盛情邀请我去乡下旅游,下榻于一家农家乐。这处农家乐正是四十多年前我下放的地方,也是我的第二故乡,算是故地重游吧。

印象中,当年来这里插队时,一切都是那样的荒凉,吃的是粗粮大锅饭,住的是土坯墙茅草房,干的是苦力活。这次回来,眼前的一切那么熟悉,又那么生疏,变得让人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了。

昔日知青点的旧房子已新盖成了琉璃瓦房,原来的大统间改建成一间间装潢一新的客房,新颖漂亮而舒适,知青就餐的“大食堂”还在,大烟囱高高耸立着,炊烟袅袅,像飘逸的彩带。

中午,朋友领着我来到“大食堂”。“大食堂”是一个大间,里面装潢一新,可供几十人同时用餐。朋友告诉我,这个农家乐是一位姓郭的师傅办的。正说着,迎面走来了一位胖胖的师傅:“欢迎回来,欢迎回来!”看着来人,我一愣,细看正是郭师傅。当年,他给我们知青点烧饭时,还是一个帅小伙,几十年过去了,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一道道印记。郭师傅与我年龄相仿,我们相处愉快,闲暇时总喜欢凑到一起谈笑聊天。他会烧菜,乡下人家办红白喜事,都请他掌勺。他烧的红烧肉,肥而不腻、入口即化。那时,他常烧红烧肉给我们吃,即使是不喜欢吃肥肉的我,也能吃上几大块。

回锡后,因生活环境改变,工作琐碎忙碌,我渐渐淡忘了郭师傅的红烧肉。

开饭了,我们一行十人正好一桌,畅所欲言,吃得舒服

自在。我又想起了昔日的知青生活,虽苦犹乐,吃大锅饭、住集体宿舍、一起劳动,多有意思啊!不一会儿,郭师傅端上了一大盆红烧肉:“你们最喜欢的红烧肉来喽。”诱人的鲜香中,大家你一块他一块地吃了起来。在城里聚餐时,肥肉从不沾嘴的老谭,也一筷不让,吃得满嘴冒油。大家边吃边称赞郭师傅的手艺,没多久一大盆肉已一块不剩。

聚会过后,郭师傅的红烧肉一直萦绕脑海。一个星期天,我约几位老知青好友来我家聚餐。众多菜肴中,就有我学做的郭师傅的红烧肉。一样的食材,一样的调料,用心做,重视每个环节,一阵忙乎后,一盆红烧肉烧好了,大家你一块他一块吃起来,但“去化”速度不快,一个口味的朋友说:“哪像郭师傅的红烧肉啊。”我吃完也这样认为。一位略懂厨艺的朋友直击要害:“你这是煤气灶上烧出来的,人家是大锅灶烧出来的,柴火大锅慢炖细煨,汤汁入骨入里,加上郭师傅的妙手,能不好吃吗!”

是啊,美食的做法可以复制,但它自带地域属性和个性特征,是匠人的绝活和匠心的传承。任何事情一旦离开了特定的环境与条件是无法完成的,就像换了环境,无论如何复制不出郭师傅的红烧肉一样。

(谢建骅)

